

# 论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 对占卜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欧阳傲雪 王 晖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一 秦始皇“不烧之书”中所指卜筮的范畴

据《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焚书时，“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sup>①</sup>

此处所说的卜筮在早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礼记·曲礼》载：“龟为卜，蓍为筮。”<sup>②</sup>《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人韩简说：“龟，象也，筮，数也。”<sup>③</sup>“卜”是根据焚烧骨头后呈现的兆纹情况来判断吉凶，“筮”则是用算筹，以所得数字奇偶情况来显示吉凶。“卜”重视“象”，“筮”重视“数”。典型的“卜”如殷墟出土的甲骨，甚至可追溯到距今八千余年河南贾湖遗址发现的骨卜。典型的“筮”因资料保存的困难难以直接寻见，但甲骨卜辞中的“数字卦”明显是关于“筮”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占卜类型不断增多，传统的“卜”与“筮”仅成为占卜这一大范畴中的两种类别。到了汉代，《汉书·艺文志·术数略》明确地将占卜活动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传统意义的卜筮在此时仅是蓍龟和杂占中的两类。

秦代的卜筮，其内容已基本与《汉书·艺文志》中所指的一致。从传世文献来看，以《秦始皇本纪》为例，其中记载的与秦代大事息息相关的占卜并非仅占卜与占筮，还有大量关于天文占卜、杂占的记载。譬如天文类的有“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

①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② 《礼记·曲礼》，《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52页。

③ 《左传·僖公十五年》，《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07页。

后死”<sup>①</sup>，“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四月，上宿雍，信侯毒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sup>②</sup>，“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sup>③</sup>，“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见东方”<sup>④</sup>。杂占类的有“三十二年，燕人卢生使人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sup>⑤</sup>“三十七年，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sup>⑥</sup>。二者兼而有之的有“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sup>⑦</sup>等。

然而占卜离不开占辞的规范和普及，占卜系统形成的基础是在大量的占辞整理成书的秦汉之际。《汉书·艺文志》将占卜分为六类，“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历谱十八家，六百六卷，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蓍龟十五家，四百一卷，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此合计为术数类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sup>⑧</sup>这些书目现在虽大多亡佚，但是据目前已出土的简帛统计，此时占卜类文献共有七十二种，其中天文类六种，历谱类二十二种，五行类二十四种，蓍龟类三种，杂占十一种，形法类六种。可见此时占卜之书的类别和数量之多。从目前出土的与占卜有关的秦代简帛来看，历谱类主要有关沮周家台秦简《历谱》<sup>⑨</sup>等；五行类主要有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sup>⑩</sup>、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sup>⑪</sup>、关沮周家台秦简《日书》<sup>⑫</sup>、江陵王家台秦简《日书》<sup>⑬</sup>、江陵岳山秦牍《日书》<sup>⑭</sup>；蓍龟类主要有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sup>⑮</sup>等；杂占类主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梦》<sup>⑯</sup>、睡虎地秦简

①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④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⑤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⑥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⑦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⑧ 《汉书》卷30《艺文志》。

⑨ 湖北省荆州市周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藏清理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⑩ 季勋：《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文物》1975年第6期。

⑪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2年第2期。

⑫ 湖北省荆州市周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藏清理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⑬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1期。

⑭ 湖北省江陵县文物局等：《江陵岳山秦汉墓》，《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⑮ 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廖名春：《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

⑯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1—328页。

《日书·诘咎》<sup>①</sup>、江陵王家台秦简《日书·梦占》<sup>②</sup>等。

关沮周家台秦简《历谱》共130枚竹简(其中有4枚白简)和1方木牍,竹简内容有秦始皇二十四年的全年干支和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等。木牍正、背两面分别抄有秦二世元年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改年十二月日干支等。<sup>③</sup>

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两种《日书》,整理者将其分为甲种、乙种。甲种现存竹简166枚,乙种现存250枚。甲种正面和背面都抄有《日书》内容,共存30个部分,乙种为单面抄写,共有50个部分。<sup>④</sup>“两种日书内容大部分相同,只有少量不同,主要内容为选择出行、裁衣、建房时日,预测诸事吉凶等。许多竹简上段设有小标题或提示。如‘除’、‘秦除’、‘稷辰’‘玄戈’、‘岁’、‘星’、‘病’、‘室祀’、‘土祀’、‘作事’、‘毁齐’、‘行’、‘归行’、‘生子’‘吏’、‘入官良日’、‘梦’、‘诘咎’、‘盗者’、‘门’、‘反支’、‘马谋’、‘木日’、‘马日’、‘牛日’、‘羊日’、‘猪日’、‘犬日’、‘鸡日’、‘人日’、‘畜’、‘男子日’、‘盖屋’、‘盖忌’、‘除室’、‘制衣’、‘初冠’、‘寄人室’、‘行祠’、‘见人’、‘亡者’、‘失火’等。”<sup>⑤</sup>

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原无篇名,由整理者根据内容及抄写形式定为《日书》甲本和《日书》乙本。甲种现存73枚竹简,分上下两栏抄写,其内容可分为月建、建除、亡者、人月吉凶、男女日、则行日、生子、禁忌八章。乙种现存竹简379枚,内容可分20多章,其中除与《甲种》完全相同的外,还有“门忌”、“日忌”、“月忌”、“五种忌”、“入官忌”,“天官书”、“五行书”、“律书”、“巫医”、“占卦”、“牡月”、“昼夜长短”、“四时”等13种。其中大部分内容与睡虎地《日书》相同。差别多在于其中包含的大量政治色彩以及天文、历法、音律等科学知识是为睡虎地《日书》所不具备。“如果说云梦睡虎地的《日书》反映了楚重鬼神而轻政治,代表楚文化的面貌的话,那么天水放马滩的《日书》则反映了秦重政治而轻鬼神,是纯粹的秦文化的典籍”<sup>⑥</sup>。

关沮周家台秦简《日书》共计竹简178枚,其内容有二十八宿占、五时段占、戎日占和五行占等。有些内容与睡虎地《日书》相同。与文字相配合的还有四幅线图,其中二十八宿占是以26枚竹简排列成一个平面,上绘有圆形线图,以两个大小不同的同心圆构成。大圆外侧的上下左右标有东南西北四方,内侧与四方相对应的还有木、火、金、水。大圆与小圆之间用28条直线分割成28块扇面对应时辰。时辰下面分别对应二十八宿名称。小圆内记载天干地支。<sup>⑦</sup>

江陵王家台《日书》中含有建除、稷辰、启门、置室生子、占梦等内容,多数内容在九店楚简《日书》以及云梦楚简《日书》中出现。<sup>⑧</sup>

①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9—446页。

②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③ 湖北省荆州市周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4年。

④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⑤ 李均明:《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⑥ 何双全:《秦汉简牍论文集·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考叙》,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⑦ 湖北省荆州市周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4年。

⑧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江陵岳山秦墓出土的两块木牍内容为“日书”。主要记载了水、土、牛、马等良日，以及祀大夫、门、灶等的良日。其中大量内容也与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一致。<sup>①</sup>

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共 397 枚竹简，格式程式化，每条卜辞前是卦画，卦画后是“卦名曰”，之后是占辞，再后是爻辞。与今本的《易》中的象、爻辞相比多采用的是古史中占筮之例。<sup>②</sup>

睡虎地秦简《日书·梦》和江陵王家台秦简《日书·梦占》归入《日书》范围，主要讲的便是占梦内容中噩梦的解除方法。<sup>③</sup>

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记述了鬼、怪、神、妖危害人的各种表现以及人应该如何预防、驱除鬼神的各种方法。<sup>④</sup>

从这些简牍中反映的占卜内容中可见，秦代的占卜与占筮已经趋于融合，秦始皇焚书令中所指的卜筮已不是本意的占卜与占筮，此处的“卜筮”基本上完全囊括卜筮和后世的其他占卜术类别。中国两千年来特有的占卜文化在此已初具雏形。

秦代出土的简牍中占卜类书目所占比例高达 35.7%。可见秦代出土的占卜类简帛所占比例之高。除占卜类书目外的出土秦简仅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役卒黑与惊之信》、《语书》、《为吏之道》（末附魏律二条）、《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sup>⑤</sup>；云梦龙岗出土的《禁苑》、《驰道》、《马牛羊》、《天赢》以及其他类<sup>⑥</sup>；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古地图 7 幅、《墓主记》、《编年记》<sup>⑦</sup>；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的《效律》<sup>⑧</sup>、关沮周家台出土的《秦简医方》<sup>⑨</sup>。

从以上篇目中便可以发现，除占卜类书目外，剩下的多是法律类书目。从这些简牍资料足见秦始皇的焚书政策贯彻之彻底，而且从简牍中占卜资料看，我们可见进一步了解卜筮之书的具体含义，可以充分认识到占卜文化在此时社会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 二 出土文献资料所见秦代占卜文化内容与 其时平民社会生活

秦代占卜事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及秦简中大量存在，这些占卜事例直观地表明秦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中许多重大事件的决定都是靠占卜术来完成的。

① 湖北省江陵县文物局、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秦汉墓》，《考古学报》2000 年第 4 期。

②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

③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321—328 页。

④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339—446 页。

⑤ 睡虎地秦简整理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⑥ 梁柱、刘信芳：《云梦龙岗秦代简牍叙略》，《简帛研究》第 1 辑，法律出版社 1993 年。

⑦ 天水市北岛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 年第 2 期。

⑧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

⑨ 湖北省荆州市周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99 年第 6 期。

信仰可分为官方信仰和民间信仰，若以《秦始皇本纪》中所载事例作为官方信仰情况的分析凭证，则上述出土简帛则可以作为民间信仰的研究依据。官方信仰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加强统治秩序，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和集体的繁荣，而黎民大众的关注焦点则多与切身利益相关，比如对收成的影响、排除灾害、社会太平，合家幸福、已故亲人安逸等。因此在官方的宗教祭祀和神学体系之外，民间社会流传的大量的神秘主义信仰、鬼神之道，便是民间信仰的由来。从出土的简帛中可见，对秦人的生活指点迷津，排忧解难有着重要指引作用的主要是择日术、卜筮、占星、占梦等。尤其是择日之术，在出土的秦代占卜资料中更是比重巨大，足见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以《日书》来看当时占卜的具体内容，上述所列出土简帛《日书》涉及的年代从战国中晚期直到秦代。从《日书》的内容看，不同时代的《日书》彼此之间的差别甚微，而这些基本差异多是由于历法不同造成。总体来说，《日书》文本结构的特征之一，即是以天文历法为基础与生活事件相连。由于出土的“日书”种类较多，此处先以内容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云梦秦简《日书》甲种来作分析。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成文年代大约在秦昭王二十九年到秦始皇三十年之间。《日书》均抄写于秦统一以前，但在秦代的墓葬中被发现，足见其对于秦代社会生活有一定影响力，吏民必以之来指导自己行事，以至死后仍不忘将其放入自己墓中。

云梦秦简《日书》甲种开篇便是《除》篇与《秦除》篇。两篇作为唯一交织着各种内容的占辞篇目与后面的各个独立成章的篇幅相比较，显得更为直观。选择其中某一日，便可直接得到此日的吉凶情况、可否做某事等信息。现将《除》与《秦除》篇中有关占卜内容进行分类列举，从中来看秦代占卜的主要内容。<sup>①</sup>

事项	《除》中的占辞
衣	“秀日……寇、製车、折衣裳、服带，吉”（简一三正贰）。
食	“央光日，利以……饮食……居有食……”（简一二正贰）。
住	“结日……以寄人，寄人必躲主”（简二正贰），“阴日，利以家室”（简六正贰）。
行	“达日，利以行帅出正、见人”（简七正贰），“外阳日，利以达埜外，可以田猎”（简八正贰），“外害日，不可以行、作”（简九正贰），“外阴日……不可以之埜外”（简十正贰），我“央光日，利以登高、饮食、邇四方埜外。居有食，行有得”（简一二正贰）。
生	“结日……生子母弟，有弟必死”（简二正贰），“阴日……家子……大吉。”（简六正贰），“达日……生子，男吉女必处于邦”（简七正贰），“【绝日】……以生子，娶孤”（简一一正贰），“央光日……以生子，男女必美”（简一二正贰），“秀日……生子，吉；弟凶”（简一三正贰）。
病	“害日，利以除凶厉，兑不羊”（简五正贰）。
死	“外阳日……以亡，不得，毋门”（简八正贰）。

①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121页。

续 表

婚姻	“阴日……娶妇……大吉”（简六正贰）。
财富	“阴日……入材……大吉”（简六正贰），“收日，可以入人民、马牛、禾粟，入室取妻及其他物”（简二三正贰）。
祭祀	“结日作事不成，以祭，闾”（简二正贰），“阳日……以祭，上下群神乡之，乃盈志气”（简三正贰），“交日……以祭门、行、行水吉”（简四正贰），“害日……祭门、行、吉。以祭最众，必乱者”（简五正贰），“阴日……祭祀……大吉”（简六正贰），“达日……以祭，上下皆吉”（简七正贰），“外阴日，利以祭祀”（简十正贰），“秀日……大祭，吉”（简一三正贰）。
盗贼	“外害日……之四方埜外，必有寇盗，见兵”（简九正贰）。
追捕	“【绝日】……桃人，不得”（简一一正贰）。
结盟	“【绝日】……利以兑明组，百不羊”（简一一正贰）。
农业	“阳日……邦郡得年，小夫四成”（简三正贰），“交日……凿井，吉”（简四正贰）。
为官	“阴日……以见君上，数达，毋咎”（简六正贰）。
吉凶	“阳日，百事顺成”，（简三正贰）“交日，利以实事”（简四正贰）“，外阴日……作事、入材，皆吉”（简十正贰），“【绝日，无为而】可，名曰击日”（简一一正贰），“秀日，利以起大事”（简一三正贰）。

事项	《秦除》中的占辞
衣	“建日……可以寇”（简一四正贰）。
食	“除日……□□□除地，饮乐”（简一五正贰）。
住	“建日……可以人人”（简一四正贰），“盈日……可以筑宫室”（简一六正贰）“平日，可以……人人”（简一七正贰），“定日，可以……为官府、室”（简一八正贰）。
行	“建日……可以行车”（简一四正贰），“摯日，不可以行”（简一九正贰）。
生	生“盈日……可以产”（简一六正贰）。
病	“除日……有（瘡）病”（简一五正贰），“盈日……有疾，难起”（简一六正贰）。
死	“除日，臣妾亡，不得”（简一五正贰）。
婚姻	“平日，可以取妻”（简一七正贰）。
财富	“除日……利市，责彻”（简一五正贰），“闭日，可以劈决池，入臣、徒、马、牛、它生”（简二五正贰）。
祭祀	“建日……可以祠”（简一四正贰），“定日，可以……祠”（简一八正贰）。
追捕	“除日……攻盗，不可以执”（简一五正贰），“摯日……以亡，必摯而公而止”（简一九正贰）“危日，可以责、摯、攻击”（简二一正贰），“开日，亡者，不得”（简二四正贰）。

续 表

农业	“盈日，可以筑闲牢”（简一六正贰），“定日，可以臧”（简一八正贰）。
为官	“建日……可以为啬夫”（简一四正贰）“盈日……可以为啬夫”（简一六正贰），“开日……请谒，得”（简二四正贰）。
盗贼	“开日……言盗，得”（简二四正贰）。
吉凶	“建日，良日也……利枣不利莫……有为也，吉”（简一四正贰），“平日，可以……起事”（简一七正贰）“被日，毋可以有为也”（简二十正贰），“成日，可以谋事、起口、兴大事”（简二二正贰）。

上表中所见，《除》篇与《秦除》篇的主要内容大致都是衣、食、住、行、生、病、死、婚姻、财富、祭祀、农业、吉凶、为官（事业）等，以及关乎自身安全的追捕和预防盗贼等内容，后面每章另分别阐述的内容与此相似，此处不再一一罗列。另有新颖之处的是《日书·诘咎》篇中对于妖魔鬼怪的预防。其内容也是极为平民化的。譬如，对付鬼怪时“牡棘为矢，羽之鸡羽，见之射之，则已矣”<sup>①</sup>（简 28 背一），此处提到的工具无一不是普通农家生活中常见的；“入人、醯、酱、洧、将中，求之而去，则已矣”<sup>②</sup>（简 26 背二），此处所用的工具也仅仅是普通人居家必备的调料品；足见这一套体系与平民生活之间的渊源关系。

除与云梦秦简日书中占法相似的部分，关沮周家台出土的秦简中的《二十八宿占》<sup>③</sup>虽然占法新颖，但每一宿占所列占项本质大致相同，主要还是对于“狱讼”、“约结”、“病者”、“行者”、“来者”、“逐盗”、“追亡人”、“市旅”、“物”、“战斗”等普通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的预测。如“尾，斗乘尾，门有客，所言者吉事也。占狱讼，胜；占约结，成；占逐盗、追亡人，得之；占病者，已；占行者，已废；占来者，承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黄；占战斗，胜，不合”（简 197—198）<sup>④</sup>。其对应的二十八分法夜半是迄今为止关于“二十八时分”时辰的最早记载，此处将一天分为：夜过半、鸡未鸣、前鸣、后鸣、才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食、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昃、铺时、下铺、夕时、日才、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之一、夜未半。<sup>⑤</sup>这种将一天的时间完整地平分为二十八个十分时辰的“一日分时之制”，体现的仍是普通平民生活节奏的变化。

“日书”盛行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主要在于其内容基本不涉及军国大事和公共事务，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生老病死和衣食居行。“日书”将这些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琐事

①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339 页。  
②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389 页。  
③ 湖北省荆州市周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2001 年，第 110—117 页。  
④ 彭锦华：《周家台三十号秦墓简牍综述》，《简帛研究 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25 页。  
⑤ 湖北省荆州市周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105 页。

的讲述与供人选择时日查阅的手册,即后世民间所说的“皇历”相结合,从内容上最能满足普通大众民间信仰需求,同时也是最简单和方便快捷的查阅工具书,“日书”集此两大优点于一身,于是逐渐成为当时民间普及率最广,信仰度最高的一种占卜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日书和历谱的传统模式,作为占卜文化中影响极大的一项,使得整个占卜文化的普及率大胜以往,自此深入了平民生活并延续至今。民间占卜术在秦代的发展和推广,与过往占卜、与前代多用于上层统治者的情况相比有了巨大转变,占卜文化在普及率扩大之余整体迅速发展。

### 三 秦代占卜文化盛行的原因探索

#### (一) 秦代占卜文化盛行的原因之一:秦始皇本人对于占卜的热衷

秦代的占卜文化发展之迅速,是由于秦代的文化政策决定的,而秦代的文化政策确是专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便是焚书坑儒。

虽然,焚书事件的影响极为恶劣,“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于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sup>①</sup>,然而由分封到中央集权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整合过程。百家争鸣的思想模式是不能适应政治统一的要求。对秦始皇建立的秦政权来说,文化思想领域需要统一,于是便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及其相应的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中华文化传统格局的形成在于刚刚建立封建统一王朝的秦汉之际,并且是通过这一时期思想碰撞的代表性事件完成的,第一次便是焚书坑儒。<sup>②</sup>

从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和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对比中可以发现,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融入的大量的鬼神气息,是放马滩秦简中所不具备的,而郭店楚简《日书》中却出现了大量的相关内容。可见云梦秦简中包含的是楚、秦两地的数术<sup>③</sup>。有学者依分析得到放马滩《日书》较睡虎地《日书》晚出的结论<sup>④</sup>,但是“因为它们(日书)主要以抄本方式流传,没有定本概念,早期和晚期的内容完全有可能混杂在一块。因此,我们探讨《日书》内容的形成时代时应持谨慎态度”<sup>⑤</sup>。这个结论未必真实准确,而毋庸置疑,在这相邻的时期陆续出现的《日书》之间的内容变化,正是文化整合造成的结果。所以在秦始皇采取的文化专制政策的强力作用下,占卜文化内部也有所变化、整合。秦代占卜的兴盛情况,正是占卜文化内部这一变化和整合过程促成的。

① 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421页。

② 赵吉惠:《秦汉时期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③ 李学勤:《睡虎地〈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④ 胡文辉:《放马滩〈日书〉小考》,《文博》1999年第6期。

⑤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秦汉之后的封建统一王朝，对于民间私习天文历法等相关数术篇目以及民间流传术数书籍都是严格禁止的。如晋武帝泰始三年下令“禁星气讖纬之学”<sup>①</sup>，此为皇帝和官府禁民间习天文术数的首例，后世沿袭至今。晋代之后“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讖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sup>②</sup>，“诸道所送知天文相术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太平兴国二年）十二月丁巳朔，昭以流失有八人隶司天台，余悉黥面流海岛”<sup>③</sup>，（景德元年春）“诏：图纬推步之书，旧章所禁，并今首纳，所在焚毁。匿而不言论者死，募告者赏钱十万。星算伎术人并送阙下”<sup>④</sup>等政策频繁出台，延续至清末。而秦代尽管实行十分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但官方允许私藏卜筮之书，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政令本身就为占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

秦始皇焚书使得前代典籍中的文明成果几乎遭到了完全毁灭，过去所盛行的私学体系基本被限制发展了，却偶然使“卜筮”之书幸运地被保留了下来，并几乎成为民间的唯一合法读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除法家思想外，其他思想、言论、主张，均被视为非法。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中可见秦始皇本人是极其信仰鬼神、重视方士的，此时若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除了研习法家之术外，以方士的身份入世无疑极为可取。而此时正好有如此之多的占卜之书流传于世，使得大量的人将眼光投入到了占卜上，为占卜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有“志”之士。

再者秦始皇的专制政策中焚烧其他类别的书籍于此时黎民百姓生活无太大关联，而对于占卜书籍和活动的正面许可反而大快人心。对于不信仰占卜的少数民众和有识之士，在文化专制政策的推行过程中，秦始皇将自己心中的占有神圣地位的占卜文化强行纳入基本文化国策之中，使知识分子的阅读书籍范围大大缩小，无疑为“卜筮之书”的流传、占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如此一来对于占卜文化蓬勃发展，使其日益成为秦汉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并对整个秦汉时代的军国大事到日常生活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 （二）秦代占卜文化盛行的原因之二：诸子思想中理性观念的式微

从殷商到西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汉时期，明显可以看到占卜文化所占地位的变化。整体来说，先秦时期的占卜之风极为浓厚。但是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商代的鬼神观极为盛行，事事占卜，时时占卜，鬼神特别是祖先神崇拜成为指引一切的唯一向导。到了周代，在“敬德保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大誓》）思想的主导作用下使得占卜被融入了一种理性的新元素，这就是尽管相信上帝鬼神的同时，但更注重统治者个人的品德修养以及人民在上帝天神心目中的重要作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观与商代已有了较大转变。从《左传》中“楚子伐陆浑

① 《晋书》卷3《武帝纪》。

②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第8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0卷，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0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6卷，中华书局1980年，第1226页。

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建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sup>①</sup> 的这段记载便可看到此时关于天命的认识已是天命可知，天命可改变，天命归于有德者。这种思想无疑是西周德治思想的继承。

春秋时期，除了楚、齐、燕等地外，其他地方的占卜之风已是大不如前。占卜已多带有政治意味，很多占卜的实质已不再只是原先的鬼神或是上天的指引，而是审时度势后作出的，是“士大夫”阶层的智慧体现。如《左传》中记载：“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子齿未多，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恶人也，不可立’。”<sup>②</sup> 这个占辞后来的应验是因为子上名为相面，实为对于商臣的平日言行举止客观考量后得出的客观预测，无外乎用天道说人事。随着占卜中理性色彩的出现，人们不再唯卜辞是瞻，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也开始出现。《左传》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言？’”<sup>③</sup> 从这一记载中可见，即使梓慎在郑国发生火灾之前就已经以星占的形式预测到了，但第二次预测却被郑国执政者子产十分坚决地否定了，并且说那是多次预测中偶然一次说中了，并不值得相信他就真的懂得“天道”；并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重要命题。这就是说人世间的万事是仅在眼前，是需要切实抓好落实的；而“天道”太遥远了，不是人世间的人们所能搞清楚的，也不需要多花气力。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的态度，亦即对鬼神抱一种不冷不热、不即不离的自然主义态度。

随着诸子思想，尤其是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以孔子、孟子、荀子为儒家思想中的理性成分的发展，对自然观、天人关系的正确认识的发展，占卜等鬼神之事在人们观念中逐渐淡化。

孔子对于天命采取的是“乐天知命”的态度，相信天命的存在，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我者其天乎”<sup>④</sup>，但通过自身道德素质的修养使自身对仁德有了坚定

① 《左传·宣公三年》，《十三经注疏》。

② 《左传·文公元年》，《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36页。

③ 《左传·昭公元年》，《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84—2085页。

④ 《论语·宪问》，《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13页。

信仰，就可以对天命和鬼神不再盲目信从，做到“君子不忧不惧”<sup>①</sup>。孔子敬重鬼神认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sup>②</sup>，却更看重人事，指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sup>③</sup>，对鬼神应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sup>④</sup>的自然主义态度。

孟子对于天命是十分尊崇和信仰的，认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知致而至者，命也”。天命是高于一切和无法改变的<sup>⑤</sup>，但是他也同样更重视人事，客观地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sup>⑥</sup>，“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农具，不如待时”<sup>⑦</sup>，“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sup>⑧</sup>，提高自身的修养是每个人应当做到的，用自己的全力“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则知天矣”<sup>⑨</sup>，以提高自身修养来顺应天命，做到以顺其自然来作为自己的修身境界。

儒家思想发展到荀子时期已出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荀子认为社会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sup>⑩</sup>，“列星随旋，日月递昭，四时代卿，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为神”<sup>⑪</sup>；于是其对于占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亏，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sup>⑫</sup>。荀子甚至更看重人的作用，更轻视所谓天命鬼神的能量，提出了“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天论》）这种著名的“人定胜天”的主张。

从孔子的相信天命存在却能做到重人事、乐而知天；到孟子的相信天命却更重人事以及提高自身修养来顺应天命；再到荀子传播的思想中已经对于占卜有了诸多直接批判，并且认为百姓之中盛行占卜并非好事，而应尽量杜绝。这一思想发展过程正是先秦士人阶层不断理性化的结果。然而，时值秦代，随着《日书》等的普及，占卜却再度大为盛行。

不论《日书》中天文历法和阴阳五行思想的理论依据是否合理，其中大量文辞亦是毫无根据的。譬如《盗者》篇所载：“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于垣内粪蔡下。多鼠蹊孔午郢。丑者，牛也。盗着大鼻，长

① 《论语·颜渊》，《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03页。

② 《论语·雍也》，《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79页。

③ 《论语·雍也》，《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79页。

④ 《论语·八佾》，《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67页。

⑤ 《孟子·万章上》，《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38页。

⑥ 《孟子·公孙丑下》，《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93页。

⑦ 《孟子·公孙丑上》，《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84页。

⑧ 《孟子·尽心上》，《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84页。

⑨ 《孟子·尽心上》，《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64页。

⑩ 《荀子·天论》。

⑪ 《荀子·天论》。

⑫ 《荀子·天论》。

头，大辟臙而傴，疵在目，臧牛厩中草木下。多徐善以未。寅，虎也。盗者壮，希须，面有黑焉，不全于身，从上辟臙梗，不疵在辟，臧于瓦器间，旦闭夕启西方。多（名）虎豸獬豸申。”<sup>①</sup>（简 69 背至简 71 背）这是一种以十二生肖代地支来附会盗者的形象的预测方法。

《鼠囊户》云：“鼠囊户，见之，入月一日、二日吉，三日不吉，四日吉、五日吉，六日不吉，七日、八日吉，九日恐。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吉，二十四日恐，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吉，二十七日凶，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吉。”<sup>②</sup>（简 28 正贰至简 29 正贰）这是一种以每月某日见到老鼠上窗户判断吉凶的预测方法。

《梦》篇云：“人有恶梦，觉，乃释发西北而面坐，皋之曰：‘皋！敢告玺。某，有恶梦，走归之所。强饮强食，赐某大幅，非钱乃布，非茧乃絮。’则乃止。”（简 13 背至 14 背壹）<sup>③</sup> 这是一种凡人做噩梦后散发向西北坐着祷告以求好运的方法。上述这些日书内容或把盗贼的容貌与地支生肖相对应，或把老鼠入户简单地与日期对应来判断吉凶，或求鬼神化解噩梦、赐予好运，都是毫无道理的，是巫术原理以及鬼神崇拜心态下出现的非理性思潮的复辟。

前面提到秦代的占卜发展表现主要是占卜内容的平民化和在民间获得的广泛流传，这与前代百家争鸣时期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对于占卜文化和鬼神天命的抵制格格不入。究其根源便是秦始皇的文化专制政策对诸子书籍焚烧的结果，使诸子百家思想中的理性思想衰微了，迷信鬼神的观念与相信卜问鬼神的方术便如火如荼地兴旺发展起来了。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sup>④</sup> 通过“坑儒”这一事件对于儒生的迫害更是限制了士阶层理性思想的传播，使得理性思想在民间的流传大大受阻，是“百家争鸣”学术思潮的扼杀，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倒退，但是客观上却为占卜文化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减少了阻力。

### （三）秦代占卜文化盛行的原因之三：阴阳五行思想的普及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方术的起源分为以下几项：① 由易学占卜之术而发展出来的预测吉凶之术；② 由古代巫术延续下来的求雨，灾之术道；③ 由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发展出来的对怪异现象的神秘主义解释；④ 由神仙传说而引发的神仙崇拜和成仙的向往；⑤ 各种宗教禁忌。<sup>⑤</sup> 以出土资料为例，可见当时盛行的“日书”形成的渊源之一便是由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发展出来的对怪异现象的神秘主义解释。

①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448 页。

②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126 页。

③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321 页。

④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

⑤ 牟宗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第 253 页。

《汉书·艺文志》将“日书”归入五行类，云：“五行者，五常之行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sup>①</sup>可见其实质即以五行思想为基础来选择时日吉凶，类似于古代所说的“日者”以式占来排列区分时日。

从睡虎地秦简《日书》来看，《日书》甲种中含有“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83背叁—92背贰）的文字，乙种也含有“丙丁火，火胜金，戊己土，土胜水，庚辛金，金胜木，壬癸水，水胜火，丑巳金，金胜木，未亥【卯木，木】胜土，□□□□，□□□，辰申子水，水胜火”（简79贰—87贰）<sup>②</sup>的文字。明确地阐述了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

从五行的角度来划分，传统的五行预测法包括了天干五行、地支五行、纳音五行等。《日书》中大量篇幅的主干源体现的就是阴阳五行思想。

以天干五行作为原理的有《病》篇等。云梦秦简《日书》甲种（68正贰—77正贰）载：“甲乙有疾，父母为祟，得之于肉，从东方来，裹以漆器。戊己病，庚有，辛。若不，烦居在东方，青色死。……壬癸有疾，母逢人，外鬼为祟，得之酉、肉、脩、节、肉。丙丁病，戊有间，己酉祚。若不酉祚，烦居北方，岁在北方，黑色死。”<sup>③</sup>这完全是以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判断病症和治愈方法。其主干可以概括为下列关于五行之间关系的表格：

五行	天干	五方	其克者	受克者	五色
木	甲乙	东方	戊己	庚辛	青色
火	丙丁	南方	庚辛	壬癸	赤色
土	戊己	中央	壬癸	甲乙	黄色
金	庚辛	西方	甲乙	丙丁	白色
水	壬癸	北方	丙丁	戊己	黑色

以天干五行作为原理的有《土忌》篇等，其文载“春三月寅，夏巳，秋三月申，冬三月亥，不可兴土攻，必死”（简一零六正）<sup>④</sup>。这与现行地支五行的酉戌对应金，寅卯对应木，子癸对应水，午巳对应火，丑辰未申对应土，再套入传统的五行代表季节：木对应春，火对应夏，金对应秋，水对应冬，几乎完全一致。唯一值得商榷的是关于“秋三月申”的说法。以五行对应四季，将土插入四季之中其做法有二，一为将

① 《汉书》卷30《艺文志》。

②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3页。

③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④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每季匀出 18 天，合 72 天划归入“土”所辖范围；一为以“土”表示夏之季夏。此处将“申”代表冬季，与今之习俗尚有差异，但无疑这句占辞的主干与地支五行一致。

纳音五行是一种特殊的五行分类方式，是将六十甲子和五音十二律结合起来，以六十甲子的每四个字代表一种特殊性质的五行。以纳音五行作为原理有《禹须臾二》等。其文载：“禹须臾·辛亥、辛巳、甲子、乙丑、乙未、壬申、壬寅、癸卯、庚戌、庚辰，莫市以行有九喜……戊申、戊寅、己酉、己卯、丙戌、丙辰、丁亥、丁巳、庚子、庚午、辛丑、辛未，且以行有二喜。”（简九七背壹——零一背）<sup>①</sup>。将五条占辞所涉及干支作表显示如下：

九	辛亥	辛巳	甲子	乙丑	乙未	壬申	壬寅	癸卯	庚戌	庚辰		
五	癸亥	癸巳	丙子	丙午	丁丑	丁未	乙酉	乙卯	甲寅	甲申	壬戌	壬辰
七	己亥	己巳	癸丑	癸未	庚申	庚寅	辛酉	辛卯	戊戌	戊辰	壬午	
三	丙寅	丙申	丁酉	丁卯	甲戌	甲辰	乙亥	乙巳	戊午	己丑	己未	
二	戊申	戊寅	己酉	己卯	丙戌	丙辰	丁亥	丁巳	庚子	庚午	辛丑	辛未

金			火			木			土			水		
海中金	甲子	乙丑	炉中火	丙寅	丁卯	大林木	戊辰	己巳	路旁土	庚午	辛未	涧下水	丙子	丁丑
剑锋金	壬申	癸酉	山头火	甲戌	乙亥	杨柳木	壬午	癸未	城头土	戊寅	己卯	泉中水	甲申	乙酉
白蜡金	庚辰	辛巳	霹雳火	戊子	己丑	松柏木	庚寅	辛卯	屋上土	丙戌	丁亥	长流水	壬辰	癸巳
沙中金	甲午	乙未	山下火	丙申	丁酉	平地木	戊戌	己亥	壁上土	庚子	辛丑	天河水	丙午	丁未
金箔金	壬寅	癸卯	覆灯火	甲辰	乙巳	桑柘木	壬子	癸丑	大驿土	戊甲	己酉	大溪水	甲寅	乙卯
钗钏金	庚戌	辛亥	天上火	戊午	乙未	石榴木	庚申	辛酉	沙中土	丙辰	丁巳	大海水	壬戌	癸亥

不难发现其与现今盛行的纳音五行表相比，“九喜”句所列干支对应的是金，“七喜”句所列干支对应的是木，“五喜”句所列干支对应的是水，“三喜”句所列干支对应的是火，“二喜”句所列干支对应的是土。相比之下，可见《禹须臾二》中列的干支分类除极少量的脱排外与现行纳音五行如出一辙。

成书时间较晚的关沮周家台秦简《日书》，与云梦秦简《日书》相比，已有变化，从二者内容中不同的部分来看，表示二十八宿占图的两个同心圆中依次以除土之外的其他四行名分类、记名；戎历占这种以特殊的历法为依据的占卜方法也均是将一个月三十天按日序加以“图符”区分，再以五行等分操作进行占卜<sup>②</sup>。另外五行占中“壬

①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465 页。

② 龙永芳：《周家台秦简〈日书〉之图符说》，《出土文献研究》第 7 辑，中国文物研究所编。

子，其下有水。”（三零二号简三栏）“卅六年，置居金，上公、兵死、阳主岁，岁在中。置居火，筑囚、行、炊主岁，岁为下。〔置居水〕，……主岁。置居土，田社、木并主岁。置居木，里社、冢主岁”，“丑（朝）有怒。（莫食）有美言。（日中）遇怒。（日昃）有告，听。（日夕时）有恶言”（二四八号简）<sup>①</sup>等文字明显反映出五行思想影响下《日书》的新发展。到汉代《日书》被归入五行类，《史记》中专设《日者列传》记录此类活动，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秦代的文化专制政策，是为了加强专制统治，树立法家思想的唯一正统地位，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思想的正统地位。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对于中华文化整合使得此后的秦文化已经不仅是纯粹如商鞅、韩非时期的法家文化。其实从战国时期的秦国开始，尤其是吕不韦编订《吕氏春秋》之际，秦文化便是一个以法家思想为主的思想吸收融合过程，“由于战国时期秦文化就广泛吸收过三晋的法家学说，也部分地吸纳过墨家、黄老、名家、儒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加上统一后博士们的影响，秦皇朝的文化中，几乎可以找到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sup>②</sup>。就秦代的官方文化整体来说，到秦王朝建立之后，从整个有秦一代的政治上的不少大事中都可以找到其他思想流派影响下的痕迹。例如，墨家思想基本融入了法家思想之中，黄老之说的“体道行德”观念体现于秦代石刻，秦始皇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sup>③</sup>。

《史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sup>④</sup>，“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sup>⑤</sup>。这些带有明显的阴阳家思想痕迹的措施自秦代开始成为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的框架。

到秦始皇开始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之时，在法家思想作为政治统治基础而在政治领域被大力推行的同时，阴阳五行思想也成为思想统治的基础。在“焚书坑儒”之时，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受到了打压，其中有利于加强统治，尤其是受到秦始皇本人青睐的阴阳五行思想则在此时被抬高，并树立了正统地位，成为中华两千年来阴阳五行思想滥觞获得政治保障的源头所在。秦代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是导致占卜之术蓬勃发展并迅速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此时的黎民百姓生活困苦，思想认识水平有限，多将希望寄托在天命和鬼神身上，希望能依靠占卜和鬼神来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指点迷津，定夺日常生活中的大事，使得自己的生活顺应天命鬼神之余减少祸端。而秦代

① 彭锦华：《周家台三十号秦墓简牍综述》，《简帛研究 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25 页。

② 孟祥才：《论秦文化对东方六国文化的两次整合》，《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

③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

④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

⑤ 《史记》卷 28《封禅书》。

的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统治的基础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和普及度则主要靠焚书坑儒等文化专制政策的实行强制完成的。可见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秦始皇的文化专制政策对于占卜文化的发展都是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的。

## 四 结 语

占卜文化在秦汉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与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秦始皇本人对于占卜的热衷和占卜类书籍在秦火中得以保存下来，无疑是促进其发展的直接原因。然而对于占卜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的根本原因，却是与社会文化发展这一大前提休戚相关的。金景芳先生曾说：“卜筮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发展过程，卜筮原生于无知，又是对于无知的反抗，而渴求有知，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它就具有两重性，掌筮的巫为了取信于人，让人们对于卜筮深信不疑，不断地向卜筮输入有知因素，经过长期积累，达到一定阶段，就产生了质变，产生了丰富的哲学思想。”<sup>①</sup>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占卜文化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同步性，占卜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密切关联。

秦代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王朝，但却是形成中国文化的比较稳定结构和格局的重要时期。其间出现的对于文化的碰撞起到极大作用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对于占卜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尽管秦始皇焚书的本意只是为了巩固王权和加强思想统治，此举虽然方法不当，但却把阴阳五行思想普及到民间百姓之中，为占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条件；而伴随诸子思想的衰微，理性思想的传播受阻，客观促进了民间占卜之风的盛行。这些措施，无疑都为占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虽然对于占卜文化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此处且不予评价，但它无疑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重视的。

[本文为200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中国早期文字与文化研究”(05JZD00029)阶段成果之一]

<sup>①</sup> 金景芳述、吕绍刚整理：《周易讲义·序言》，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